

不读此书,不足以言钱
读罢此书,不能言钱
而当今世界,无论何人
都不能不谈钱!



黑

伸向金融界

手

· 暗健 编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黑手伸向金融界

——中国金融犯罪大透视

妙手空空，小偷行窃；
伸手图库，大盗横行。

32亿元非法集资，谁在呼风唤雨？
1800万元股金外流，谁能瞒天过海？
500亿美元引资，谁不望而兴叹？
4.5亿元关税流失，谁能翻云覆雨？

如此阳光下的劫掠，其数额之巨，无不令人胆战心惊；如此夜幕下的豪夺，其手段之高，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当今秘室事，坑、蒙、拐、骗、连环计、溢满书卷；天下奇闻，惊、险、绝、种、黄梁梦、力透纸背；读此奇书，令人透骨深思！

编 者

序篇 恶梦醒来是早晨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金融经济的时代。

——金融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竞争性的金融体系趋于成熟；

——“股票”、“债券”、“头寸”、“贴现”等愈来愈多的术语已成为社会公众生活的活跃语言……

空前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几十年前曾艰难萌动的金融意识得以复苏，而且拉开了在社会主义经济舞台上塑造现代金融形象的帷幕。

金融不仅仅是货币、信用和银行，金融还是一种文化。它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士，这一段历史正生动地再现在我们的周围；它是当代经济结构改造和升迁的孕育体，这一使命已经得到或者必将得到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现实的验证。

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金融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金融犯罪象一股巨大的黑潮，在世界金融的海洋中不和谐地涌动着，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国际金融的岸头。

在中国，金融犯罪来势之猛，毒害之深，令人闻之生畏，在中国金融的风口浪尖上，视钱财如己命，视欺诈为游戏的犯罪者们，象煞有介事的巫师一般，丧心病狂地经营着他们梦中的点纸成金术……

犯罪者，历来为人们所痛恨，受害者，损其钱财、伤其名分、害其躯体、累其家族、甚至丧邦辱国，祸莫大焉。犯罪，是一种不仁不义的行为，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犯罪，又是一种故意谋取不当利益、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犯罪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有一些人就靠犯罪来牟取暴利、致人于死地。

犯罪，可以害人于一时，却不可能骗人一世。但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为人所欺，受人欺作，总归不是令人赏心悦目之事。被人欺作，或为弱者，或为无知，或为无能，或因贪小而失大，或为内外勾结。所谓祸起萧墙，皆事出有因，不足为外人道，自不足为世人所怜悯。然而，从事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者，却早晚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俗语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玩火者必将自焚，天理昭然，世事若揭，一切敢于在风口浪尖上翩翩弄点纸成金术的“勇士”，都势必溺死于中国金融法制的汪洋大海之中。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溺水者”，往事不堪回首……

0.1 来自铁窗内的警世通言

——一个“溺水者”的忏悔

在卷入金融犯罪狂潮，被金钱腐蚀，成为金钱的俘虏和走卒的人中，骆×无疑是可悲的。年轻的他，风华正茂时，有着令人羡慕、收入丰厚的职业，不惜用青春赌明天，却无法“潇洒走一回”了。

在冷峻森严的大墙里，在冰冷无情的铁窗下，骆×写下了这段哀婉的忏悔：

“我是一名在大学入党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自小就是长辈眼中的乖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大学里也一向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工作。我为自己能在1989年动乱后第一批入党而高兴，且以优秀学生的称号光荣地告别了母校，踏上工作岗位，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阳光，成长道路上铺满了鲜花。正当我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却万万没想到会滑入泥潭，并越陷越深，直到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我辜负了悉心培养我的党，辜负了翘首期待我的家长、老师、同学、朋友们。

我原在荣欣证券公司道里营业部任报价员兼电脑操作员，1992年7月大学毕业后，作为优秀毕业生分配到了荣欣证券公司。当时听说证券行业的效益好、收入高，心里特别高兴，一进单位，每月就能拿到1000多元。当然工作也很辛苦，几乎天天都要加班。有时加班结束，天已经亮了，第二天还得继续上班，若问我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现在想想，除了我当时不懂法以外，还与工作环境有关。

我当时在大户室任报价员，接触的全是大户，看看他们赚钱蛮便当的，我也就心动了。我有一个姐姐，小时候发高烧，大脑烧坏了，她在街道福利工厂上班，一个月仅100元的收入，自己生活也

不够。父母过去曾对我说过，姐姐今后的生活要靠我，父母不可能负担她一辈子。于是我就想，看看人家赚钞票多容易，我也可以利用现在的位置赚一些、存一些，以备将来使用。

我经常接触的一些客户，称不上很大，但也是中等大户吧，他们手中都有上百万的资金，对我很客气，经常“小骆，小骆”地叫我，然后就把香烟扔过来，让我在操作时照顾照顾他们。当时我看到他们炒股票赚钱很容易，大把的钞票在几分钟里就进来了，我也想这么做，但只有1000多元，要做的话，也赚不了多少差额，比不上他们，几分钟就能赚进几万元。

应该讲，我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看到他们这样大把的赚钱，就感到心理不平衡了。我进单位后，开销就开始大起来，有时为了摆派头，上下班就叫“面的”——尽管我家离单位不太远。到我案发前，“面的”发票已经一厚叠，怎么办呢？就让客户给我报销。另外，为了摆派头，我经常叫几个朋友在外面乱兜，我“挺帐”。进单位两个多月，我基本上晚上都不在家，在外面玩卡拉OK等，直到深更半夜回来。时间一长，就感到开销大了，超过了自己的收入，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半个月就花完了。这时我就想到了股票。感到炒股赚头很好。

当时证交所电脑正好已改进，买卖股票统计允许当天进出，但制度还不完善，没有明确强调当天验资，这就使我觉得有空子可钻，于是，我就用透支的方法，自己报价进行交易。当时我只想，客户可以这么做，我也可以做，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么做是违反了工作人员不能炒股的这一条纪律。

我从1992年12月28日开始为自己炒股票，当天买进卖出，用的是客户的资金帐户，到了1993年1月19日前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没有输赢，基本拉平。春节前，证交所上市了一个新股票——新世界，我听一些股民议论，说行情还能看涨，就想自己拉一笔，一下子买进了8万股“延中”，价值100多万，结果没料到，当天

就跌了一元，加上手续费，一下子就亏了10多万。我想，第二天大概会反弹。到了第三天又拉进了很多，有5种股票，价值190多万，结果这天没有涨跌，就亏了一些手续费，两天下来已亏了14万。过完春节，我又做了两笔，也是没亏没赚，这样帐面就留下了14万元的红字。我担心经理要查，于是就动用了客户的钞票。也是我不懂法，以为客户的钱就是客户的，我动用时只要和他们打个招呼，征得他们同意就可以了，也有些是事后打招呼，一些客户也基本口头答应借给我。当时，我用了第一个客户17万资金，他说，以后他来拿时，只要还得出就可以了。就这样，我一共借了5个人计37万资金，基本上是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到了2月4日，大势还没反弹，我就没继续做，但那天我动用了最后一个人的资金，大约1万多元，因为事先没和他打招呼，第二天上午他来了，发觉资金少了，找到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带他到了经理室。经理知道后，就开始查我的帐，并把结果告诉了公司，公司又派人下来查我的帐，到了2月19日，检察院来人，把我带走了。

后来，我因挪用公款460余万元、贪污12万元而被人民法院判处20年重刑，我将在孤独中度过漫长的、与我目前年龄相仿的刑期。

我当时从未想到会有今天的下场，当时买进卖出不要验资，而我那时又没本钱，这对我来说正好是个机会，反正又不要我的资金，而且还可以利用差价赚一些钱。但我从没想过使用这么一大笔资金，万一亏掉怎么办？我自始至终都坚信这样做是能够赚到钱的，或者说只要做了就一定能赚。

初进单位时，我也不知道这些纪律，对我们这些新进人员，单位里也没有专门给我们上过课，也没有宣布过这些纪律，报到后就上岗了，出了事以后才知道。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工作的，尽管比较辛苦，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确实没有料到，自己也感到很可惜。我不是个不要前途的人，

当时我一边工作，一边还在自费读英语，准备有朝一日能出国深造，尽管人很辛苦，但想到我还年轻，多学点知识以后总能派上用场，可现在……

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吃的，我已经在社会中扮演了一次不光彩的角色，给父母脸上抹黑，给“优秀毕业生”几个字抹黑，我好悔好恨，悔自己当初不该一时财迷心窍，一失足成千古恨，恨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丢失了不说党员即使是普通公民也应具备的本色，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被金钱腐蚀了，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现在对于我来说不是沉湎于昨天所犯错误的巨大痛苦中，而是要及时总结教训，提高思想意识，挖掘出思想深处恶毒的肿瘤，与昨天的一切彻底决裂，使自己重新走到光明大道上来。”

古人云：“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骆×的忏悔无疑是催人泪下，令人扼腕叹惜的。但是，慨叹之余，人们也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犯下如此深重的罪恶？为什么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证券公司竟然对骆×的胡作非为全然不知？为什么即使曾经这样优秀的年青人也只能在身陷大牢之时才恍然醒悟自己的错误？

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当然，这其中也势必包含着历史的原因，那就让我们返回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审视来自远古的罪恶。

0.2 骗中骗，驴背上驮来的古老神话

近代中国金融的变迁是复杂的，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前，中国还没有银行，只有钱庄和票号，以及从事消费信贷的典当。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陆续出现了许多新式金融业。旧式的钱庄、票号也逐步发展、成熟、走向顶点最后消亡。本文也就主要以近代中国金融百年的变迁为背景，作一些介绍。

鸦片战争之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受外在压力和内在力量的多种因素极大的冲击。再加上一些旧式习惯、传统仍有其存在的土壤。中国各行各业都呈现一种纷繁复杂，又极不稳定的状态。金融业也不例外，当时的金融市场上，旧式钱庄、票号与银行、保险证券等新生事物并存，外资金融业又和民族金融业并存。再加上社会政治变动更迭，金融业既没有一个适于健康发展的好环境，也没有完善成形的法规；更常常成为政治的工具，帮助统治者剥削掠夺，控制经济。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更容易出现形式多样的金融欺诈。

谈中国旧社会的金融不能不说到上海，近代的上海的富庶程度，一直都堪称全国之最。“十里洋场，遍地黄金”，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的故事在整个华夏都广为流传。于是更多的冒险家、骗子，甚至一些想捞一把的外国人都纷至沓来，旧上海鱼龙混杂，既有腰缠万贯的富商财主，又有不值一文的混混，但都做着一个共同的发财梦。灯红酒绿与贫民街巷之间的强烈反差，使无数人铤而走险，不惜以任何代价追求金钱。于是黑帮林立，腐败丛生，在繁荣的表面下隐藏着大量的矛盾与症结。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在这个骗子与冒险家的天堂中，金融业成为首矢之的。这个直接和钱打交道的行业中，金融诈骗层出不穷，造成的危害极大、影响面极广。每一次诈骗都带来了无数家庭破产流离、父母卖儿卖女的人间惨剧。另一方面，或有无数的巨富豪阔一夜间一无所有，举债自杀；或有大量的新贵在一夜间成为众人艳羡的对象，进出豪宅，娇妻美妾前呼后拥，好不自在。

在众多的欺诈案例中，一些普通的贪污、违例操作相比之下显得不怎么起眼了。我们只选一些影响巨大、最为著名的典型例子来分析。这些案例都是大骗案、骗中之骗。

一、“美国国际集团”的由来

1990年7月美国《幸福》杂志，重点介绍了总资产达57亿美元的“经营多种业务”的一家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它是当前美国同行中最大的公司之一，1988年名列全美第18位，1989年跃至第16位。近十年来，美国国际集团的股息增长率居全美第4位。公司雇员有2万余人。总部设在纽约松树街一幢巨型的摩天大厦，这座办公楼在周围众多的高层建筑中，仍显得气势雄伟壮观，堪称“鹤立鸡群”，象征着这家公司在同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知道美国国际集团历史的并不都仰望艳羡，还有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为什么呢？原来国际集团的原董事长科尼科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斯塔尔，就是在旧上海外滩十七号桂林大楼混迹发家的落魄流氓史带。他于1892年10月15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小镇富特·布赖格。因其貌不扬，嘴歪肩斜，又因“斯塔尔”叫起来不大顺口，故得了“歪嘴史带”的浑名。早年他当过新闻记者，做过保险公司的捐客，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过职员。因在一桩敲诈案中得罪了一个有来头的人，难以立足，便于1914年底远涉重洋，逃到亚洲。起先在越南干猎象的行当，不得意，便于1916年挟着一只破皮包，闯进了上海黄浦滩。当初的史带，囊中空空，住不起旅馆和公寓，只得在四川路转角南京路口的层顶“老虎窗”下蜷栖安身。然而，十几年以后，他就坐镇外滩桂林大楼，凭借保险业务吮吸了中国人民无以计量的血汗，从此腰缠万贯，名扬世界了。

史带原先想到上海搞律师业务，但一到上海，审视当时的情况和自己的社会关系，只得改变计划去《字林西报》当记者。不久史带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他受到美丰银行老板、著名的“冒险家”雷文的青睐，被收罗到美丰，管理银行的保险业务。当时美丰在上海代理美国普益保险公司的业务，所以史带在那时大开了眼

界，了解金融行业的知识与操作技能，但同时也学到许多坑蒙拐骗的花招。相传当时史带刚进入金融行业时，就对此行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耳闻目睹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冒险家从来时的一无所有成为巨万之富，深爱这一可以帮助“胆大者”成功的行业。于是他就非常留意去学那些“窍门”，并注意多和此行当的“名流”接触，臭气相投。很快史带便成了精通金融知识和骗术的行家。

当时英商已在香港设立保安保险公司，从1843年在上海设立永福、大东方等保险公司开始，各帝国主义国家陆续到上海设立自己的保险公司、或分公司、或代理处。到史带在上海接触保险业务时，中国人自己经办的保险公司还寥寥无几，而洋商保险业在上海的活动已有80年历史，积累了许多搜刮中国人民血汗的经验。史带这个骗子出身的冒险家，自然对此十分投机，很快地学会了中间的奥秘，认识了许多“路子”，因此史带决心自己开设保险公司，在上海大捞一票。在雷文的帮助下，史带很快与美国几家保险公司订立了代理契约，于1919年12月12日正式成立一家美亚保险公司，注册在美国，总公司设在上海，办公室就在四川路南京路转角（后来的福利公司），专营中国业务。起初只是代理大美洲和亚洲等几家美国保险公司的业务，后来才进而代理英国的大不列颠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美亚的业务逐渐扩大，范围不断开拓，到1927年，便搬进了史带一直自鸣得意的外滩十七号桂林大楼。他把这幢九层大楼称作“发祥地”，是有一定道理的。经过几年活动，他就建立一个由自己拥有的数家保险公司为核心、所控制的许多中小华商保险公司为隶属、以桂林大楼为基地的实力强大的美亚保险集团，成为外滩唯一以保险为主的大楼、世界闻名的保险窗口。因而，史带一度被誉为“运车保险王”。

然而史带改不了的是他的骗子本性，在他迅速发迹过程中，他靠的是大量“高超的技巧”。当时华商公司大多起步不久，财力都较薄弱，承保额小。但由于华商公司的关系较为广泛，有较固定的客

户和潜力。史带看到这种情况，就吩咐买办等合力打入华商公司，并对前来要求分保的华商公司，提出种种挑剔和苛刻条件，设置藉以控制华商公司的樊篱，从而驾驭它们。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史带得到了巨额的不正当的收益。另一方面在他的公司周围建立了一大群由他所控制的外国机构，为他以后的扩大和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而且一大批中国民营的公司就被他扼住了咽喉，只能对他唯命是从。史带还利用不同的费率揽夺华商的生意。上海保险费率委员会是由洋商把持的，当史带取得垄断地位后，就利用这一条件对华洋保险订出不同费率。同一被保险物，洋商的保险费要比华商低一半。洋商们还利用这一委员会对华商制造了多种其他形式的限制和障碍。这样使许多华商的业务就被他夺走了。史带在上海的各种恶劣行为不胜枚举。1946年，当部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的保户联合起来向他索取满期的保险金及死亡赔偿金时，他存心抵赖，说中国币制几次变更，折算以后早已不值钱，坚持拒绝偿付原币（银元）或按实物价格折合。众保户不接受，准备向法院起诉。史带知道后，即迅速将公司紧急迁移香港，逃之夭夭。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又大捞了一笔。然而，在他的贪欲满足的后面，是多少中国人民的损失！

这一事件的发生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旧中国当时本身就遭到列强欺侮，国家都抬不起头，也就难怪洋商们丧心病狂地欺詐了。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一直受到外国银行的冲击，外国银行使用各种恶劣手段，凭借其雄厚资金和政治特权屡次在中国制造金融混乱，以实现其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目的。外国在华金融机构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剥削收益，仅以保险为例，1937年中国保险费收入的75%流向国外，而华商的收入只占25%，美亚集团业务收入占中国保险费收入的30%，即一年从中国带出1164万元。

二、“橡皮股票风潮”

“橡皮股票风潮”发生于1910年间(清宣统二年),那时的上海已经日益成为金融中心,资金从四面八方流入。这些资金在运用和调剂中,常有多余资金,就拆放给上海钱庄,最盛时达到一千数百万两。一家几万两资本的钱庄,拆款可达七八十万两,投机性十分严重,小资本经营大买卖,信用过分扩张,直接间接造成了危机来临的条件。

风潮是因购买虚假不实的橡皮公司股票而引起的。这次风潮中英资蓝格志公司和它外商勾结起来,欺骗了大量的人。从中饱私囊、甚至携款潜逃海外。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二十世纪初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使橡胶的销售量在国际市场上急剧增大,特别是英、美两国当时对橡胶的需要量迅速增长,1908年到1909年英国橡胶进口从八十四万英镑增为一百四十一万英镑,同期美国进口从五千七百万增为七千万美元。但橡胶生产供应受种种限制,短时间不可能迅速增长。国际市场橡胶价格因此而不断上涨。这一点刚好被外商们利用了。

在橡胶的需要量及其价格都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情景下,1903年,英商麦边洋行在上海设立以经营橡胶园、采掘石油和煤、以及采伐木材等业务为名的兰格志(橡胶产名)拓植公司。这家公司取得了外国在华银行的支持,并且极力宣传它所发行的股票可以在外商银行照票面押借现款,从而博得华商、钱庄和官僚的充分信任。

当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频频报涨时节,上海股票市场上的橡胶股票的市价随之同步上升。设在上海的其它外商洋行也竞相在上海开设橡皮股票公司。特别是从1909年冬天开始,上海市面橡皮股票的市场价格在长达六、七个月的时间内,涨势旺盛。市场心理都认为购买橡皮股票,便有重利可得。所以,到1910年,在上海

开始的橡胶公司便增加到四十家之多。当年的一项记载称：“上海股票公所之名簿上，该公司[指橡胶公司]又加三十五，被攫资本银二千万两。且由上海兑款至伦敦购买该股份者，为数甚巨。”在这狂热的橡皮股票投机活动中，上海的钱庄又是主要的参与者。它们不仅以大量短期贷款贷放给投机商人，而且自己也积极收购和囤积该项股票。新旗昌洋行(Sewan, Tones & co)买办陈逸卿同时又是上海正元钱庄的主要投资人之一，他广泛地利用自己与中外金融力量相联系的关系，调动了与之相往来的钱庄，如正元、谦余、兆康、会大、元丰、森源等信用行，同时还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款项，大量买进橡皮股票。在陈逸卿的影响下，正元钱庄也积极购票三四百万两，谦余、兆康等十余家钱庄亦有巨额购存。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金额约为二千六百万至三千万两之巨，投入伦敦市场的约为一千四百万两。从而上海钱庄其中可以调动的资金几乎完全被橡胶股票公司所吸收了。其后果便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强烈地感到缺乏资金的支持。

1910年6月，国际市场上橡胶行情出现下跌倾向。伦敦市场在4月间，每磅橡胶的价格还高达十二先令五便士，到七月底便降低到九先令三便士，而且明显地表现为继续下跌的倾向。当这一消息传到上海市场后，橡皮股票价格立即从高峰跌落，转为持续的下降。试观1910年3月间，售价是白银七十两，及至1910年9—12月间，上海市场上，十股橡皮股票的售价只为七两。当时积存大量橡皮股票的正元、谦余和兆康三钱庄，都因橡皮股票价格跌落，出现资金周转失灵，被迫于七月十五、十六两日失灵后宣告闭歇，亏欠私款项达数百万两，牵累到与它们有往来的大小钱庄数十家。此外，这三家钱庄所欠洋行庄票的款项为一百五十万两。外国在华银行目击上海金融市场颠簸不稳，便扬言收回全部拆款，上海市面遂因之更为紧张。当时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款，据称已在一千一百万两到一千三百万两，是维持上海金融市场流通的一支重要力

量。外国银行此时厉行收回拆款，立刻加速了因橡皮股票价格猛跌而引起的金融危机的到来。不但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上海及其近郊，这时已没有数十家工厂，雇佣了近三十万工人，这些工厂运营资本一向不足，每日发放的工资都是靠厂家向钱庄进行抵押贷款。各厂持钱庄庄票要向外国银行领取现银发放工资的。现在外国银行拒不接受庄票，各厂工资便无着落。这无疑促使上海市场面临的危机更加尖锐了。

为了稳定上海市面，清政府的上海道蔡乃煌只得出面周旋。他向汇丰、麦加利、德华等九家外国银行借款三百五十九万两，另由道库拨借三百万两，借给几家主要的银号和钱庄，如源丰润银号、德原、原吉等钱庄。这一措施暂时地缓和了上海金融市场的颠簸程度。

但到了9日，正届每年缴付庚子赔款的期间，当年应支付一百九十万两。不料蔡乃煌所掌管的道库竟是“库空如洗”，拨借给源丰润等庄号的票号一时也无法收回。上海道遂请求度支部“饬大清银行拨二百万两以救眉急”。这一请求自然引起度支部的强烈反感，它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敷，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建议清政府予以“革职”处分，并勒限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缴清”。在这种情况下，蔡乃煌只得令贷用官款的银号、钱庄限期归还借款。于是上海金融市场再次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在举借上海道库官款的庄号中，源丰润是一个大户，它所借款项计一百二十万两。源丰润是由宁波巨商严信厚、严义彬父子经营多年的银号，一向以资力雄厚，信誉卓著见称。它在全国各省和主要商业城市共设有分号十七处。在蔡乃煌为上海道库催还官款的情况下，源丰润周转失灵，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达二千余万两。它的分号也同时告歇，立即引起了各地金融的强烈波动。金融界十分恐慌，仅北京受牵累而关门停业的就有十六

家。至1911年3月下旬另一大票号义善源，受源丰润银号倒闭的牵累，也以负债一千四百万两而破产。

这次事件对中国金融的打击相当巨大，这里固然有众多钱号拆借过多、入不敷出、过分投机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外国金融势力的有预谋的欺诈。先是英国麦边成立公司，吹嘘它的经营范围包括开辟橡胶园、发掘石油煤炭、采伐木材，其实这只是一个空招牌，五六年中它并没有什么业务。到了1909年，恰巧发生了世界性的橡胶涨价，国外开发成功的橡胶园企业主和投资人因而获得丰厚利润。麦边以及其他橡胶公司的主持人就利用这一时机，施展他们冒险家伎俩，大搞宣传鼓动，并联合外国银行建立了更多的橡胶公司。人们受到这些诱惑，购买橡皮公司股票的人就大大增加，票面一百荷盾（约合六十两白银）的蓝格志公司股票市价被哄抬到一千两，超过股票面额的十六七倍。于是更多的虚假公司建立，各公司也大量地增发股票。蓝格志公司每三个月就发放股息一次，以示他的公司确实赚饱了钱。这全是假象，实际上，公司赚的不是橡胶的钱而是股民的钱。但还是有大量盲目的狂热购买这种股票的中国人。中国的商人、富有资财者、甚至少数的清朝地方官吏，也一股劲地拼命购买，有的还借了别人的钱来购买，外资的银行也允许用股票作抵押贷款，这也就为橡胶公司证明了资信。股市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金钱流入。在表面的繁荣之中，危机已经快来了。外国冒险家感觉这种赚钱的魔术无法再演下来了。便迅速抽走资金，暗中抛出了手中持有的股票，很多外商携款潜逃海外。这时的大多数股民还不知道真相，仍在希望自己手中的股票能够继续上涨。外国银行却一律宣布不再承做这种股票押款。所有的股票迅速变为废纸，大批的金融机构、厂家连续倒闭。外资银行却落井下石，气势汹汹地要求清偿债务。最后只能是懦弱的清政府偿款了事。上海的钱庄因“橡胶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1909年时有钱庄100家，到1911年只剩51家，几乎减去了50%。外国银行接着变本加厉

后，利用清政府为了维持向它借款的时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从而卡住了中国工商经济和金融的脖子。

这件事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骗局，却真实地反映了外资操纵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矛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中也反映出这种情况：外资通过其买办完全操纵了证券市场的涨落，采用欺骗的手法控制市场，击败了民族资本，也逼得人民家离子散，上吊自杀。

三、100万两黄金的巨案

这出黄金贪污的闹剧，是解放前最大的一件金融案件。这样说不仅指数额巨大、影响广泛，更因为它牵扯出当时政坛上的头面人物蒋介石、宋子文。经查，这次黄金案最大后台就是蒋介石，被牵涉贪污人员有宋子文、贝祖贻，以及很多的中央银行职员、金号老板等。这次事件发生后，由于各派利害关系的冲突，引起蒋介石政权内部一场政治风波，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都因此下台。

解放前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完全是掌握在四大家庭手中的。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这件案子的主要参与者宋子文。

宋子文父亲是牧师，姐妹兄弟均在美国读书。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和别人合开了一个贸易公司，后投奔孙中山去广东。1924年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地位。曾任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黄金案发生时他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四大家庭中的第二把交椅，可谓身居高位，又有蒋介石的支持，自然可以为所欲为、假公济私了。

早在1944年9月，蒋介石政府为了骗取人民的金钱，借口吸收游资，在重庆由中央银行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和“法币预购黄金期票”。到1945年3月29日，黄金牌价由每两2万元提高到3.5万元。提价前，风声已经泄漏，有关银行人员利用职权，乘机大量购储黄金。由此掀起了风潮，闹得重庆满城风雨。后来这次风潮